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十六編 第十九冊

《史記》校勘研究

王華寶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六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9 冊

《史記》校勘研究

王華寶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史記》校勘研究／王華寶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2+17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六編；第19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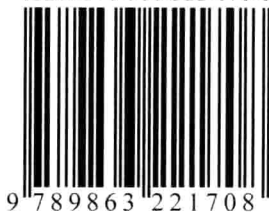
ISBN：978-986-322-170-8（精裝）

1. 史記 2. 研究考訂

011.08

102002358

ISBN-978-986-322-170-8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六編 第十九冊

ISBN：978-986-322-170-8

《史記》校勘研究

作 者 王華寶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年3月

定 價 十六編 30冊（精裝）新台幣 5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史记校勘研究

徐复



《史記》校勘研究

王華寶 著

作者簡介

王華寶，1965年7月生。江蘇揚州人。文學博士。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師從徐復、錢玄、吳金華、趙生群等先生。原為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編審，現為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社會兼職主要有：中國訓詁學研究會理事，中國史記研究會理事，江蘇省語言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清學和段王之學學術研究諮詢委員會」副主任等。從事古籍編輯工作二十多年，所編圖書三十多次獲得省部級和國家級圖書獎。學術研究方面，出版個人學術論文集《古文獻問學叢稿》（中華書局），獨立整理《四書集注》《近思錄》《戰國策》等多種，參與或合作整理《冊府元龜》（校訂本，周勛初主編，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說文解字校訂本》（三人合作，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多種，在《文史》《古籍整理研究學刊》《古籍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現正參與「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訂工程」的《史記》修訂工作（趙生群主持）、《宋人軼事匯編》（周勛初主編）、主持《王念孫集》整理等。

提 要

《史記》校勘研究是《史記》文獻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史記學」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該文以享有「集千餘年來學術研究之大成的善本」，在《史記》版本校勘學研究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之美譽的中華書局校點本《史記》為中心，從古文獻學的角度，綜合運用校勘學、版本學、漢語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知識，參考相關資料，進行較為系統的校勘研究。

《緒論》部分闡述了《史記》校勘研究的意義、歷史和現狀，研究的方法和原則，對《史記》校勘研究的幾點認識。正文四章，第一章在分析校點本所依據的底本金陵書局本局限的基礎上，通過與金陵書局本的重新覆校，在校點本與局本400多條異文的基礎上，指出校點本的排印錯誤和徑改之類的古籍整理失範之處。第二章通過對校點本所依附的主要校勘材料張文虎《札記》8957條校記（包括新增部分）的逐條分析，探討校點本對張文虎《札記》具體的採擇情況，特別是當擇而未擇與不當擇而擇的問題。第三章通過版本異文校勘、對前人校勘成果的吸收不足以及校點本產生以來的一些科研成果的分析，舉例探討校點本存在的校勘問題。第四章從專名、書名號、與引號相關的標點符號、語詞等角度，列舉時賢及作者本人發現的校點本部分標點符號可商之處，供大家討論。

該文認為，校點本存在著底本校對不精，某些文字處理不合古籍整理規範，漏校、誤校不少，已有研究成果吸收不夠，標點可商之處不少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有必要在古文獻校勘理論和科學方法的指導下，充分吸收學術新成果，對《史記》文本重新進行較全面而系統的宏觀考察和微觀剖析，這是新世紀《史記》整理研究工作向縱深發展並爭取獲得突破性進展的需要，也是豐富古文獻學基礎理論特別是完善校勘學理論的需要。21世紀也需要更能體現當代史記學研究水準的《史記》新文本。

該文通過對《史記》版本及其他文獻異文，對《史記》語言文化等的研究，認為《史記》金陵書局本與許多晚出的文本一樣，優點是明顯的，缺點是隱而不顯的；校點本是在特定的時代出版的，她不可能不帶有那個時代的局限——底本對校、整理的指導思想、觀念、方法、材料及研究水準，等等；張文虎《札記》不能作為校點本的校勘記，校點本應當有自己的校勘記。《史記》研究總體而言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而校勘仍是薄弱環節。同時指出，忽略了版本問題，難免失校；忽略了語言文化的研究，難免誤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古文獻的校勘水準，必須特別關注上述兩個方面。

該文不僅梳理了《史記》整理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為《史記》整理研究和語言研究提供了數百條可參考的具體意見；同時，也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多角度探討古文獻校勘的理論問題，提供了一些看法。對《史記》整理、語言研究和古文獻研究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節 《史記》校勘研究的意義	3
第二節 《史記》校勘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6
一、《史記》的流佈與刊刻概貌	6
二、《史記》校勘研究的歷史	17
三、《史記》校勘研究的現狀	26
第三節 關於研究的方法	36
第四節 對《史記》校勘研究的幾點認識	42
第一章 校點本與金陵書局本對校研究	49
第一節 金陵書局本及其不足	49
第二節 校點本與金陵書局本對校研究	53
一、排印錯誤	54
二、關於古籍整理規範	78
三、局本與《札記》不一致的問題	88
四、局本存在的其他問題	89
第二章 校點本與張文虎《札記》對比研究	93
第一節 張文虎《札記》研究	93

第二節 校點本與《札記》關係的基本判斷·····	98
第三節 校點本對《札記》具體採擇的研究·····	100
一、《札記》之說宜參者·····	100
二、校改可商者·····	108
三、二說取一說或校改不全者·····	110
四、與《札記》之說不一者·····	111
五、《札記》之說未當而不可取者·····	111
第三章 校點本校勘問題舉隅·····	115
第一節 《史記》版本異文校勘·····	116
第二節 校點本校勘問題舉隅·····	124
第四章 校點本標點問題舉隅·····	143
第一節 校點本標點問題舉隅·····	144
一、專名問題·····	144
二、書名號問題·····	147
三、與引號相關的問題·····	148
四、與語詞相關的問題·····	150
五、其他問題·····	152
第二節 標點致誤的原因分析·····	153
餘 論·····	157
參考文獻·····	161
後 記·····	169

緒 論

中華書局 1959 年初版、1982 年再版的校點本《史記》，以清同治年間（同治五年至九年，1866～1870）唐仁壽〔註 1〕、張文虎〔註 2〕等校勘的金陵書局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為底本，參考明凌稚隆《史記評林》〔註 3〕、清吳見思《史記論文》〔註 4〕、張裕釗校刊的歸（有光）方（苞）評點本和吳汝綸的點勘本等的句讀〔註 5〕，依據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

〔註 1〕 唐仁壽（1829～1876），字端甫，號鏡香，浙江海寧人。家饒於財，購書累數萬卷，多秘笈珍本。究心於六書音韻之學，喜讎校經史，藏書蕩於兵火。後為曾國藩招致金陵書局，生平所為書均未就，獨有詩若干卷藏於家。

〔註 2〕 張文虎（1808～1885），字孟彪，號嘯山。南匯縣周浦鎮（今屬上海）人，清後期著名學者。同治二年（1863），張文虎赴安慶入曾國藩幕。三年（1864）入金陵書局。陳大康《張文虎日記·前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版）說：「校勘《史記》諸書，前後長達十年。同治十二年（1873）冬，張文虎以衰老辭歸，後主講於南菁書院，卒於光緒十一年（1885），終年七十八歲。」有《舒藝室隨筆》、《續筆》、《餘筆》、《覆瓿集》等著述及日記四冊存世。

〔註 3〕 《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明浙江凌稚隆輯校，重要版本有明萬曆四年（1576）凌氏刊本，五年刊本；明萬曆間建陽熊氏種德堂刊本、熊氏宏遠堂刊本，雲林本立堂刊本（此三種皆為李光縉增補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清光緒十七年（1891）長沙養翮書屋校刻本；清光緒十年（1884）湖南劉鴻年翻刻本等。

〔註 4〕 《史記論文》一百三十卷，清康熙年間江蘇武進人吳見思（1621～1680）著，有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尺木堂刊本、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桂垣書局刊本、1936 年廣益書局刊本、1986 年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版陸永品點校整理本等。

〔註 5〕 歸震川評點史記一百三十卷附方苞評點史記四卷，明歸有光（1507～1571）評點，有清光緒二年（1876）武昌張裕釗（1823～1894）刊本，1915 年上海同文圖書館影印本，1918 年交通圖書館石印本。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一

等，進行全新的分段、標點、校理，對部分古字、異體字進行處理〔註6〕。學術界公認其兩大特點，即「分段精善」、「技術處理合理」。校點本《史記》被譽為「是學術界繼唐代三家注定本以來最精善的一次整理，集千餘年來學術研究之大成的善本，在《史記》版本校勘學研究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為我國古籍整理做出了有典範意義的重要貢獻」〔註7〕。《史記》校勘研究是《史記》文獻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史記學」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

本書以中華書局校點本為中心，參考相關資料，進行《史記》校勘研究。緒論部分，闡述《史記》校勘研究的意義、歷史和現狀，研究方法和原則，對《史記》校勘研究的幾點認識等。正文四章，第一章「校點本與金陵書局本對校研究」，在分析局本局限的基礎上，通過對校點本所依據的底本金陵書局本的重新覆校，在校點本與局本 400 多條異文的基礎上，指出校點本眾多的排印錯誤和徑改之類的古籍整理失範之處。第二章「校點本與張文虎《札記》對比研究」，通過校點本所依附的主要校勘材料張文虎《札記》8957 條校記（包括新增部分）的綜合分析，探討校點本對張文虎《札記》具體的吸收情況，特別是當擇而未擇與不當擇而擇的問題。第三章「校點本校勘問題舉隅」，通過版本異文校勘、對前人校勘成果的吸收不足以及校點本產生以來的一些科研成果的分析，舉例探討校點本存在的校勘問題。第四章「校點本標點問題舉隅」，從專名、書名號、與引號相關的標點符號、語詞等角度，列舉時賢及自己發現的校點本部分標點符號可商之處，供大家討論。餘論則主要闡述本書的價值、解決的問題，以及有待開拓的領域等，以引起讀者的進一步思考。

本書力求在對《史記》重要版本、新見《史記》文獻研究資料（包括出土文獻等）、學術成果等進行較全面梳理的基礎上，對校點本誤校者試辨正之，校點本漏校者試補正之，前人雖有卓見或致疑而未為校點本所用者試申正之。筆者認為，校點本存在著底本校對不精，某些文字處理不合古籍整

百三十卷，清桐城吳汝綸（1840～1903）點勘，吳闓生編錄，有清宣統元年（1909）南宮邢氏刊本，清宣統二年（1910）桐城吳先生群書點勘本，1930 年南宮邢氏刊本。

〔註6〕詳參中華書局1959年版《史記》的《出版說明》、《點校後記》等。

〔註7〕安平秋、張大可、俞樟華主編：《史記教程》，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頁。

理規範，漏校、誤校不少，已有研究成果吸收不夠，標點可商之處不少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有必要在科學的方法指導下，充分吸收學術新成果，對《史記》文本重新進行較全面而系統的宏觀考察和微觀剖析，推出新的《史記》整理本。這是新世紀《史記》整理研究工作向縱深發展並爭取獲得突破性進展的需要。21 世紀也需要更能體現當代史記學研究水準的《史記》新文本。

筆者 2001 至 2004 年在南京師範大學讀書學習期間，在趙生群教授指導下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史記〉校勘研究》。本書正是在論文基礎上修改後的一個階段性的結果。為論文所做的數十萬字的校勘資料長編，一是仍需進一步梳理比勘，並進一步參考相關研究成果；二是為減少篇幅，本書暫付闕如，以待時日。在本書行文中，對於所引用的文獻，一般保留規範繁體字，涉及版本差異、校勘、標音等問題，酌情使用一些古體字、異體字。

第一節 《史記》校勘研究的意義

司馬遷《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宗旨，上溯黃帝，下論漢武，熔三千年歷史於一爐；以「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之語」的氣概，創構五體，包羅萬象，匯百科性知識於一編。《史記》無愧於「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語）的美譽，是中國文化史上一部體大思精的百科全書式的經典巨著，也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它在史學、文學和其他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高度推崇。對於司馬遷及其《史記》的研究已歷時二千多年，一門新的學科——「史記學」逐漸形成〔註 8〕。包括《史記》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等內容的《史記》文獻學，應當是構成「史記學」的重要的基本內容。《史記》校勘研究則是《史記》文獻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史記學」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

〔註 8〕 陝西師範大學張新科教授所著《史記學概論》，初步為「史記學」建構了一個理論框架。全書分範疇、價值、源流、本質、方法、生存、主體七論，共十七章，闡述了有史以來司馬遷和《史記》研究的主要成就，並將之概括為 35 門 278 目，既有宏觀概述，又有微觀透視，可以參閱。商務印書館，2003 年版。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中華書局校點本《史記》（以下簡稱「校點本」）以及相關的論著。由於時代的變遷、舊本不易得到等因素，校點本《史記》早已成為人們學習和研究《史記》的首選之本。該本以清同治年間唐仁壽、張文虎等校刊的金陵書局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以下簡稱「局本」）為底本，參考明凌稚隆的《史記評林》、清吳見思的《史記論文》、清張裕釗校刊的歸方評點本和吳汝綸的點勘本等的句讀，依據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以下簡稱「張文虎《札記》」，清同治十一年刻本）等，對《史記》正文及三家注進行了全新的分段、標點、校理，對部分古字、異體字進行處理，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績，被譽為「是學術界繼唐代三家注定本以來最精善的一次整理，集千餘年來學術研究之大成的善本，在《史記》版本校勘學研究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個眉目清楚、閱讀便利的新校點本已印行 50 多萬冊，是人們學習和開展《史記》研究工作最常用的、權威的文本。校點本《史記》也就成了人們開展《史記》校勘研究的一個新的起點。而校點本《史記》是在特定的時代出版的，校點本未能、也不可能不帶有那個時代的局限——整理的指導思想、觀念、方法、材料及研究水準。

〔註 9〕時至今日，我們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現代學術水準、新理論的指導、眾

〔註 9〕關於二十四史的整理，參加《宋史》整理的裴汝成在《心中始終裝著作者讀者》一文中說：「在校勘方面又遇到了思想認識和實際問題。當時的一個關於整理二十四史的檔上說：校勘以版本對校為主；又說：校勘要避免繁瑣考證。大家對這兩條的理解和掌握頗不相同。」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我與中華書局》，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 185 頁。關於《史記》的整理，謝方在《改造定位 創業——記 1950~1965 年的中華書局》一文中說：「《史記》的點校原由顧頡剛負責，他因老病在身，由他的助手賀次君代做，但問題很多，金燦然很不滿意，就請宋雲彬在顧先生的基礎上重新再點。這是 1959 年國慶的獻禮書，所以他的工作繁重而緊迫。」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我與中華書局》，第 387 頁。此條資料承周勛初先生惠示，特此鳴謝。宋雲彬先生的日記《冷眼紅塵》有相關且詳細的記載，可參閱。關於二十四史的整理情況，已出現多篇介紹文章，如《趙守儼文存》所收趙守儼寫於 1986 年的《風風雨雨二十年——「二十四史」始末記略》（又見《回憶中華書局》，中華書局，1987 年版），《書品》1997 年第 4 期所收蔡美彪《二十四史校點緣起存件》。關於《史記》的情況，謝方為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於 1957 年 9 月進入中華書局的首批大學生，在《史記》編輯出版時正與宋雲彬同室辦公，所言較可信。又，筆者看到一份落款為「中華書局編輯部 1961 年 7 月」的《史記勘誤表》，稱：「我局標點本《史記》，於 1959 年 9 月發行第一版後，經檢查發見了若干標點的錯誤及錯字。除於再版時改正外，特列勘誤表，印發給持有第一版的讀者。」經統計，總共有 436 條，其中涉及文字改動的有 20 條。436 條已不算

多新發現的資料和科技高度發達等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研究，以期獲得新的進展。

關於校勘與校勘學的性質和功用，陳垣在《通鑒胡注表微·校勘篇》中曾說：「校勘爲讀史先務，日讀誤書而不知，未爲善學也。」錢玄先生認爲：「校勘，是指用精密的方法、確鑿的證據，校正古書中由於抄寫或翻刻等原因而產生的字句、篇章等錯誤。」「校勘學應該屬於文獻學的一門學科，因爲它是以古文獻爲研究對象的。它跟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等都有密切的關係，校勘需要綜合運用這些學科的知識、理論來進行工作，所以校勘學是一門綜合的、應用性的學科。」〔註10〕程千帆、徐有富先生認爲：「校勘工作是從事學術研究，特別是古代典籍研究的起點。而且審慎精密的校勘成果往往可以防止和杜絕許多望文生義的無稽之談，爲獲得正確的結論準備了條件。」〔註11〕可以認爲，在現代意義上，校勘是指對某種古籍進行校讀勘定，使之復原存真，爲閱讀或研究提供一種接近作者原作的文本的學術工作。

準此指導思想，本書以中華書局校點本《史記》（第二版）〔註12〕爲中心，從古文獻學的角度，綜合運用校勘學、版本學、漢語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知識，採用窮盡性的方法等，研究面廣量大的《史記》校勘材料及相關資料。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通過對當今權威的《史記》版本校點本進行較充分的考察和鑒定，探討其中存在的底本、校勘、古籍整理失範、標點等各種問題，爲今後編纂《史記》新整理本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爲今後開展全面的《史記》專書研究積累材料，爲「史記學」打造更好的學術平臺；另一方面，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史記》，把握這部巨著的精神內涵。這不僅是新世紀《史記》整理研究工作向縱深發展並爭取獲得突破性進展的需要，而且也是豐富古文獻學基礎理論特別是完善校勘學理論的需要。

少，但仍有未見於此表的。

〔註10〕 錢玄：《校勘學》，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頁。

〔註11〕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校勘編》，齊魯書社，1998年版，第33頁。

〔註12〕 此指1982年11月第2版的1985年10月北京第9次印刷本。實際上，1977年8月中華書局出版的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賀次君點校本，已有初版、再版的概念，如「中華本初版改之，再版改正」（第236頁）。當指某次印刷本，與目前學術界使用的版次概念有所不同。又，校點本《史記》的歷次重印本、線裝本，多有小異，宜區別對待。

第二節 《史記》校勘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史記》校勘研究與《史記》的流佈和版本，與古籍校勘史、古籍出版史和學術發展史等密切相關。因為在流佈過程中，由於傳抄、刊刻等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版本。版本的不同，就可能存在文字上的差異。我們在考察《史記》校勘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時，必然要關注《史記》的原始版本及流佈情況，關注各個時代古籍校勘的特點等。在《史記》研究的領域中，對於《史記》校勘的研究可以說是最具基礎性和挑戰性的研究。也可以說，《史記》研究的進步是伴隨著《史記》版本校勘研究的進步而前進的。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於這一基礎性難題，不斷進行深入的探討，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這些輝煌的成就正是今日《史記》校勘研究的新起點，因而對前代學者與時賢研究中的成就與不足，做一個較全面的回顧和總結，有利於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從而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進一步開拓《史記》研究的新局面，為校點本《史記》修訂工作創造條件。基於此目的，本節首先力圖對古代的《史記》版本特別是《史記》校勘研究做一個較系統的介紹和簡要的評述。

一、《史記》的流佈與刊刻概貌

《史記》成書之時，正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確立之際，在正統思想家眼中，《史記》有「謗書」之嫌，其流佈受到了限制。^{〔註13〕}《太史公自序》稱「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據現代研究成果，認為「藏之名山」，指所謂正本；「副在京師」，指所謂副本。副本流佈在先，正本流佈在後。據《漢書·司馬遷傳》載：「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漢書·楊敞傳》後附《楊惲傳》載：「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史記》先以單篇的形式流傳，自西漢末宣帝時，司馬遷外孫平通侯楊惲宣佈後，整體為世人所知，流佈民間。正、副本均為後世各本之祖本。楊惲應是《史記》的第一個傳播者。

漢代桓寬《鹽鐵論·毀學》記載桑弘羊在鹽鐵會議上為自己的「興利」政策辯護時引用《貨殖列傳》中的一些資料「司馬子言『天下壤壤，皆為利

〔註13〕 安平秋、張大可、俞樟華主編：《史記教程》第十一章「《史記》流傳」稱「兩漢是史記學的厄困時期」，第410頁。

往』，以此來反對儒生們「重義輕財」的觀念，並尊稱司馬遷為「司馬子」。楊海錚指出：「據所能看到的史料記載，最早引用《史記》的人是桑弘羊。」

〔註14〕時間約在漢宣帝時代，開節括引用《史記》文章之先。

《史記》產生異本、文字歧異應該是在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等續補《史記》之後。〔註15〕袁傳璋推斷，《史記》正本「藏之名山」，傳於其女，秘存華陰，後由其外孫楊惲免官家居時「宣佈」，自此民間始有《史記》抄本流播；「副在京師」，進呈御府後，不僅慘遭砍削，「十篇缺，有錄無書」，而且嚴禁外傳，唯班斂蒙賜御書之副。以後班彪在安陵評《史記》、作《後傳》，班固在洛都蘭臺奉詔撰《漢書》，皆據此副本又副本。太史公手錄的《史記》正本佚於楊惲蒙難；副本毀於王莽之亂；副本又副本亡於董卓移都。東漢流佈之一百三十篇《史記》，當係正、副本兩大系統抄本配補而成，已失太史公手定正、副本舊貌。〔註16〕袁先生之論雖多推測，有待相關材料的佐證，然言之成理，可備一說。

《史記》流佈史上，亡缺與續補竄附問題，一直是聚訟紛紜的重大課題，至今無定論，有識者歸為「《史記》疑案」，張大可《史記殘缺與補竄考辨》、《史記斷限考略》〔註17〕、趙生群《〈史記〉斷限辨疑》、《〈史記〉亡缺與續補考》等文〔註18〕，是當代較為重要的相關成果。班彪云：「（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後漢書·班彪傳》引《略論》）《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漢書·司馬遷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遷之自序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漢書·藝文志》根據劉向、劉歆父子所著《別錄》、《七略》節縮而成，凡有部類調整、篇目增省，無不一一注明。據以上所引資料可知，《史記》在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已缺十篇。班彪「家有賜書」，有《太史公》秘書之副本，劉向、劉歆、班固則都曾典校秘書，他們認定《史記》十篇有錄無書，應屬可信。第一個列出《史記》亡書篇目的

〔註14〕《漢唐〈史記〉研究論稿》，齊魯書社，2003年6月版，第19頁。

〔註15〕參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9～13頁。

〔註16〕袁傳璋：《太初、麟止、於茲——〈史記〉敘事起訖與主題演變考論》，中國史記研究會第一屆學術討論會論文，2002年2月於重慶。該文收入安平秋、閻崇東主編的《史記論叢》，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版。

〔註17〕兩文分見《蘭州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又收入氏著《史記研究》，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

〔註18〕兩文均收入《〈史記〉文獻學叢稿》，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是張晏〔註19〕，他說：「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對於張晏列的十篇亡書，不少學者有不同看法。爲此，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詳加考辨，證成其說，提出了不少精闢的見解，可參看。趙生群先生認爲，從《史記》的版本、體例、內容三個方面綜合考察，不難知道今本《史記》雖然十篇篇目俱在，但已不是史公原作。

三國魏張晏曾說，《史記》十篇既亡，「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註20〕褚少孫續補篇目有明文可考者共六篇：《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傳》、《滑稽列傳》。褚少孫續史六篇加上補亡之作四篇，總計褚氏續補《史記》達十篇之多。趙生群先生認爲，褚少孫續補《史記》，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全部標明「褚先生曰」，而且往往明言材料來源及作文目的，絕無魚目混珠之嫌。後人把沒有標明「褚先生曰」的續補文字一起歸到褚氏名下，明顯欠妥。二是褚氏續補的文字一開始就依附於《史記》而行。此外，《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之後，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據趙生群先生研究，兩漢時真正續補《史記》的，只有褚少孫、馮商二人，其他人都只是續而沒有補。

唐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史通》所舉各家，除馮商外，其餘都是續載太初以後事。諸家續書多鄙俗，且零星不成系統，班彪採其事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固在此基礎上撰成《漢書》，各家續書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故《漢志》均未著錄。

〔註19〕張晏，生卒年不詳，三國時魏中山人，著有《漢書音釋》四十卷，已佚。

〔註20〕《漢書·司馬遷傳》顏師古注引。《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索隱略同。

而與流佈相關的另一問題，即刪減問題，也應給予一定的重視。胡寶國認為：「比兩漢之際發端的經學刪減運動稍後，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刪減之風。」〔註 21〕對《史記》而言，就有多次刪減。如《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史要》十卷。」注：「漢代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後漢書》卷八四《楊終傳》：「（楊終）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同卷《應奉傳》注引袁山松書說：「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衛颯、楊終、應奉等對《史記》的刪減，無論出於什麼目的，對《史記》的流佈終究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造成亡缺，或產生異文等。因文獻的缺失，具體的情況我們難以詳悉，但在相關問題的研究中，宜有《史記》流佈過程中曾經過「刪減運動」那麼一種意識。

東漢中期以前因受到當政者的嫉恨和當時文化氛圍的限制，《史記》流傳不廣。《西京雜記》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恨，削而去之。」班固《典引》記載漢明帝曾說：「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因此，當政者多方阻撓《史記》的傳播。另外，當時的文人學士，多崇尚鋪張揚厲、對偶工整、語言華麗的辭賦，不能理解《史記》自由奔放、參差不齊的散體長短句的風格，正如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序》所言：《史記》「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臥，良有以也。」《史記索隱後序》又言：「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闕蓋多，或旁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加之當時史學仍作為經學的附庸而列入《春秋》類中，未取得應有的獨立地位，種種因素都影響了《史記》的傳佈和研究，《史記》只是在上層極小的範圍內流傳。

東漢中期以後，《史記》儘管仍未獲得較高的評價和應有的重視，但已開始得以較廣泛的傳佈，東漢桓、靈時代，《太史公書》已正式稱為《史記》〔註 22〕，清人梁玉繩《史記志疑》稱：「《史記》之名，當起叔皮父子。觀

〔註 21〕《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2003 年 11 月版，第 85 頁。

〔註 22〕楊明照《〈太史公書〉稱〈史記〉考》，載《燕京學報》第 26 期，舉五條例證來論證《史記》書名始於東漢靈、獻之際。陳直《太史公名稱考》，載《文史哲》，1956 年第 6 期，舉九條例證來論證《史記》書名始於東漢桓、靈之際。此說已為學術界多數人接受。